

热烈庆祝祖国50华诞
嘉定解放50周年专辑

嘉定文史

刊例



第十五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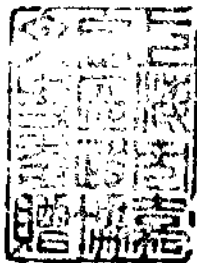
上海市嘉定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嘉定文史》编辑委员会编

嘉定文史

第十五辑

(内部资料)

热烈庆祝祖国 50 华诞
嘉定解放 50 周年专辑



上海市嘉定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嘉定文史》编辑委员会编
1999 年 3 月

EC78/19
《嘉定文史》编辑委员会名单

顾问
童清仁 孙 镇

编 审
张德昌 何根法

执行编辑
钱乃之 陈一凡

编委
(姓氏笔画为序)

毛炯炯 吕炳兴 沈云娟 张昌革 陆慰萱
陈叔达 陈炳生 赵 杰 施心超 葛秋栋

校 对
金 明

1987年，
在中共
嘉太宝
工委中
料座谈
会上；上
海局外
县工委
书记周
克(前右
六)；嘉
太宝工
委书记



徐嘉(前右五)、委员罗明(前左一)；嘉中支书李立群(中左二)、聂群(中左三)；嘉
定青年小教支书秦浩(中右四)、副支书潘世超(后右五)；地下党员廖临(中右
六)、童礼娟(中右五)、金伏兴(肖银，中左六)、董方(中右五)、叶士仁(中左四)、
潘世和(后右七)。▲

1949年，
南翔市
各界人
民庆祝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
集会游
行中的
棉业公
会队伍。



►



◀1959年,上海市卫生局长王聿先(右二)、嘉定县副县长马秀升(左一)、南翔镇长鲁福昌(右一)等,陪同中央卫生部长李德全(左三)视察南翔镇爱国卫生运动。



▲ 1950年,陈之平在其工作的中央新闻摄影局门前。



▲ 秦浩同志遗像。

目 录

厉兵迎旦

嘉定解放前夕我参加地下工作的片断·····	潘世超	1
记“嘉中”地下党两位支书·····	潘仁爱	20
我为《微音》写新年献词·····	陈之平	26
周明星在嘉定解放前后·····	肖 银	28

晨钟初响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潘世和	40
在难忘的日子里·····	陆象贤	47
忆嘉定解放前后·····	张烨宇	58
黎明时分 ——1949年5月在浏河、嘉定的 一些回忆·····	朱敬禹	64
奔向光明·····	钱乃之	79
庆解放,迎新生,跟党走走了50年·····	朱正非	87
回顾“华东新闻学院”讲习班·····	陈之平	92
嘉定解放初期隐蔽对敌斗争的片断回忆·····	金伏兴	101

丽日经天

我和“乒乓外交”	钱 江	119
人间正道是沧桑		
——纪念嘉定解放 50 周年	鲁 叟	128
回眸过去,拓展未来	朱谱强	132
我爱伟大的祖国	高步阶	137
书香溢囡城		
——嘉定区新华书店 50 春秋	陶继明	142
市郊率先搞承包的封浜朱家村	施心超	150
嘉定耕牛盛衰史	吕炳兴	153
超越甘泉		
——嘉定区外冈自来水厂为民服务见闻	施心超	157
锡剧《珍珠塔》解禁记	王继新	163

深情缅怀

和许广平相处的日子	童礼娟	165
不尽的思念	潘世超	173
卫生红旗插南翔,不忘聿先老局长	鲁福昌	186
追念印克同志	高步阶	189

各领风骚

记民建北京市委名誉主委浦洁修	张冬玲	191
----------------------	-----	-----

摩托罗拉公司里的中国女白领·····	姚旭参 陶继明	206
无私奉献义务推拿的陈纪文医生·····	江义生	215
燃烧的白玉兰		
——记退而不休的特级教师徐永森·····	陈一凡	222

海外来鸿

给家乡父老朋友们信·····	朱谱康	227
----------------	-----	-----

嘉定解放前夕我参加地下工作的片断

——纪念嘉定解放 50 周年

潘世超

嘉定解放快 50 周年了。我有幸在嘉定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为家乡的解放做了一些工作。在半个世纪之后,回顾这一段亲历的往事,印象仍然非常深刻,倍感亲切。

嘉定地下党组织吸收我入党

1948 年 10 月份的一天,詹彪同志突然来复旦大学找我,问我入党的情况。事情的起因是,9 月份我曾经找过他,告诉他,我已经在复旦递交了《自传》,申请入党了。当时他听了表示很高兴,对我说希望你好好干;同时又告诫我,这样的事不能随便对别人讲,要注意保守秘密。我口头上答应着,心里却想,正因为你是共产党,所以我才告诉你的。后来复旦地下党组织认为,我虽然在思想觉悟、对党的认识等方面都可以,但在实际行动上还不够积极主动,往往是一到节假日就离开学

校回家了，有几次假期里学生运动的斗争活动没有参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党组织没有批准我的入党申请，告诉我还要对我考验一段时间。詹彪同志来找我询问情况，我就如实地告诉了他。詹彪一听这个情况，马上对我说：“我们了解你，我们可以吸收你入党。你回嘉定工作吧。”我当然非常高兴，立即表示愿意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回嘉定工作。詹彪让我等候他的通知，准备进一步详细再谈。

我焦急地等待着，终于盼来了詹彪的通知，约我到他那里去。我按时来到他的住处（当时他在上海某商店当会计），在那里见到了罗明同志。詹彪给我介绍说，这位是上级党的负责同志，今后由他领导你，与你联系，布置你的工作。罗明同志简单地询问了我的一些思想情况、对党的认识、入党要求等问题后，便对我说：我们对你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决定要吸收你入党，并派你回嘉定工作。他特别对我强调了地下党秘密工作的组织纪律问题。告诉我：党的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的，一定要严格遵守上级领导的指示，严格按照上级领导规定的时间、地点去取得联系。只要有一次没有遵守规定，接不上头，你就可能永远失去组织联系，永远找不到上级领导了。因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只有上级知道下级的情况，下级根本不知道上级的姓名、住处、行踪等情况的。接着罗明同志给我布置了回嘉定工作的两项任务：一是设法在嘉定找一处合适的住房，他要搬到嘉定去住。公开的借口是，他是我在复旦大学认识的法律系同学，名叫罗致荣（这时他才说出他自己的姓名，其实这也只是他在解放前用的姓名，解放后我们才知道他叫罗明）。他的妻子叫徐联珠（徐嘉同志在解放前用的姓名），是个小学教员，因患肺结核病，想到嘉定找个比较僻静的地方

休养一段时间。二是对嘉定的工商业界进行调查研究,对嘉定工商业界的有关人士进行宣传党的政策、团结教育的工作,开展对中间阶层的统战工作。而最主要的工作对象是我的父亲潘指行,要设法做好他的工作,争取他靠拢我们党,接受我们党的领导。

这次谈话后,我便怀着一个新党员的喜悦心情,于1948年12月初离开上海回到嘉定,按照罗明同志布置的任务,开展了党的地下工作。

现在看起来,我的人党过程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和快速。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嘉太宝工委于1948年10月成立后,为开展工作,很需要吸收象我这样条件的人参加工作。另一方面,在此之前,詹彪同志已经对我进行了两年多时间的了解和考察。我和詹彪相识是在1946年上半年,嘉定勤业中学教师张乃敏主持组织嘉定青年联谊社的时候。张乃敏是我们高中二年级的级任老师,思想比较进步,经常给学生讲国内政治形势、国共和谈和内战的形势等问题,很受一些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的欢速。成立嘉定青年联谊社时,我们年级的同学都参加了。詹彪同志也是青年联谊社的社员,他当时虽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仍以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心,自觉地开展工作,发挥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他积极推动和支持张乃敏组织嘉定青年联谊社,并通过这个组织做团结教育青年群众的工作。他主动找我,告诉我他与我二哥潘世藏是普通小学的同学。我听张乃敏说过,詹彪在抗日时期参加过是新四军,后来是新四军北撤时因病留下来的(他的一条腿走路有点跛,据说是骨结核)。我因受几位兄姊的影响,在抗日初期,就开始看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书籍,思想上对共产党一直是

有好感的。抗日胜利的初期，革命的和进步的书刊一度也很容易看到，所以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理论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当我听说詹彪是新四军、共产党时，便对他产生了好感，愿意和他接近。于是开始了我和他的亲密交往。在嘉定青年联谊社时期，我们勤业高二年级的一部分同学在张乃敏影响下曾组织过一个“学习小组”（并无正式的名称和组织形式），大家传阅一些进步的报刊，如《民主》、《周报》、《文萃》等，有时还有党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我们还组织过一些讨论，并请张乃敏和另一位老师许兆奎（许曾和张是同学，思想也比较进步，他们一起积极组织嘉定青年联谊社）参加，给予指导。通过这个“学习小组”的活动，大家对国内政治形势，对国民党的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及其腐败专制、亲美卖国，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等，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新的认识。詹彪同志知道了我们的学习活动，有时也主动来参加。我也不把他作为外人，欢迎他来帮助我们提高认识。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秋，张乃敏因遭国民党地方反动当局的追捕，被迫逃往上海。嘉定青年联谊社自动解散，我们的“学习小组”也停止了活动。不久，詹彪也去了上海，但我和他仍保持着联系。1947年秋后，我高中毕业考进复旦大学读书，我们便在上海经常见面了。我认识詹彪后，他自己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他是共产党员，我也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但在我心里认为他始终是一个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在这几年的交往中，詹彪比较详细地了解了我思想的发展、对党的认识、入党要求，以及我的家庭等各方面的情况。所以到1948年10月，他得知我在复旦没有被批准入党时，就毫不犹豫地：“我们了解你，我们可以吸收你入党。”

据我后来的了解，詹彪于1948年初与党组织（昆嘉青工委）接上了关系。1948年10月，党的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从原昆嘉青工委分出来建立中共嘉太宝工委，统一领导嘉定、太仓、宝山三县的地下工作。詹彪的组织关系也就转到了嘉太宝工委。当时嘉太宝工委的书记是徐嘉，罗明是委员，詹彪把我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于是我很快被吸收入党，并被派回嘉定工作。

关于我的入党，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的：第一，入党时间问题。1948年11月罗明与我谈话时，明确表示同意发展我入党并派我回嘉定工作。后来他于1949年阳历新年到嘉定时又对我说：党组织已于12月20日正式批准你入党。所以解放后我第一次填干部登记表时，在入党时间一栏填的就是“1948年12月20日”。由于解放前地下党一般都无个人的文字材料，所以这份干部登记表是我个人档案里的第一份正式材料。第二，入党介绍人问题。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谁，解放前入党时并没有明确过。解放后填表时，我考虑到当时我只接触到詹彪和罗明两个人，所以在入党介绍人一栏填上了他们两人的名字。第三，预备期（当时叫候补期）的问题。我入党时并没有明确说过。但我知道党章规定，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入党，一般候补期应为半年。后来，1949年2月任命我为青年和小教支部的副书记兼宣传委员，则好像已不再是候补党员，因为候补党员是不能担任党内职务的。但我自己也不能自己定为没有候补期。所以解放后填表时在何时转正一栏里留下了空白，不知道怎么填法。1949年7月，我离开嘉定到北京中央团校学习时，嘉定县委给我开的组织介绍信上写的是正式党员。在经过松江时，刚好在地委遇到徐嘉同志。

我拿出干部登记表(当时干部调动,档案材料都是自己带的,而且也不密封,我当时的档案就只有这么一张登记表),提出关于我的人党候补期的问题。徐嘉考虑了一下,亲自在我的登记表的何时转正一栏里填上了“1949年6月20日”,即候补期为半年。

完成了安排徐嘉、罗明 到嘉定居住的任务

罗明同志布置给我回到嘉定工作的第一个任务,是设法在嘉定找到一处合适的住房,以便他和徐嘉搬来居住。解放后,我才知道他们两人是嘉太宝工委的领导,需要搬到嘉定落户,在第一线就地领导工作(嘉太宝工委的另一位领导,副书记李成吾同志到太仓落户)。

我回到嘉定后,很快就设法找到一处很理想的住房。那是在城内北下塘街51号,房主人叫朱士龙,是个工商业资本家。他家刚好在我的一个中学女同学潘文娴家(北下塘街49号)的隔壁。我与这位女同学比较熟,经常去她家玩,所以与朱家也比较熟了(朱士龙本来与我的父亲是熟悉的,朱家还有一位老太太,我叫她“二婆婆”,好像是有点很远的亲戚关系,所以很容易攀谈起来)。朱家一进大门的前院有两间侧房,一直空着。我认为这两间房子很合适,就和朱家商量,按罗明所讲的借口,提出借房子的事。朱家一听说我的同学要借用,便很痛快地答允了,不但一应桌椅床铺等家具都是现成的,而且房租多少也不计较。这两间房子在一进大门的前院,主人进

出只从院子里经过，而房客进出大门不需穿过主人的住处。所以是相对独立，互不干扰。就大的环境来说，此处虽然已近城中心，离塔前、州桥不远，但北下塘街平时行人稀少，是比较僻静的。问题是隔河就是国民党县党部。可是考虑到国民党县党部那边进出都是走北大街，一般不会过河拐到下塘街这边来，而从下塘街这边出去，也不需要过河经过县党部的大门口。所以只要行动上小心一点，住在这里是不会引人注意的。

1948年除夕的下午，罗明以我的同学的名义，借新年放假为由，从上海来到嘉定我家里。我把他介绍给我的父母，我父亲很热情地接待了他。罗明同志不会喝酒，但晚饭时还是陪我父亲喝了两盅，喝得满脸通红。饭后回到卧室，我责备他不会喝酒何必勉强去喝。罗明很认真地对我说，陪着喝点酒，可以说说话，这也是抓紧时间做工作啊。第二天是阳历新年，我陪他去北下塘街朱家看了房子。罗明认为很好，当时就把租房子的事定了下来。

没有过几天，罗明和徐嘉就带了简单的行李来到了嘉定。我带他们到朱家，一切安顿下来。罗明又让我去通知詹彪。我便来到西大街詹彪家开的米店，在店堂里我对詹彪说，我的一个同学夫妇两人来嘉定住，要买点米（好像说的是要两斗），请他送去，并告诉了罗、徐的地址，詹彪当然心领神会。当天下午，詹彪用自行车驮了半麻袋大米，假装送货上门，就很容易地与徐嘉、罗明接上了头。

后来，我还以同学的名义，为徐嘉和罗明在镇公所办了登记户口的事。由于我是本地人，又有我父亲的关系，所以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安排徐嘉、罗明到嘉定居住、落户的任务。

关于做好我父亲工作的问题

罗明布置给我的第二个工作任务，是做对嘉定工商业界的调查研究工作，争取嘉定工商业界的上层人物，发展统一战线，为迎接解放作准备。而这项工作的主要对象，就是我的父亲潘指行。

当时嘉太宝工委确定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我的父亲，是这样分析的：“潘当时是嘉定县参议会副议长，中央合作金库嘉定分理处主任，又是县商会的会长。他自己虽然没有多少资产，却是嘉定工商业界的一个较有威望的领袖人物，是他们的一位政治代表。潘又是嘉定教育界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早年他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任教。后到嘉定担任过教育局长。任职期间他创造和推行中心小学的制度，联合邻县在安亭创办昆嘉青乡村师范学校，仿行陶行知所办的晓庄师范的办学经验，还起用陈奉璋为嘉定县中校长。他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推动创办本县电灯公司、电话公司和葛仁慧医师为首的普济医院，得到社会各界好评。他政治上倾向民主，不满国民党的腐败专制，始终没有参加国民党。……做他的统战工作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的子女多数已经是共产党员，二女儿还是顾复生的夫人。”（引文见1987年5月12日徐嘉在中共嘉太宝工委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黎明前的战斗》，载中共嘉定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的《嘉定党史资料通讯》总第十七期），我们做好他的工作，再通过他在嘉定工商业界和一些地方上层人士中进行工作，就可以有效地争取中间阶层，发展统一战线，减少解放前的动乱和破坏，为迎接解

放作好准备。

当罗明布置我做我父亲的工作时,一开始我是满有信心。因为据我平时对我父亲的了解,他虽然一直在国民党统治下做事,但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专制是很不满意的。他虽然没有表示过拥护共产党,但也从来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我二姊潘世清去新四军参加革命,后来又与顾复生结婚,他在家从未说过一句批评、指责的话。我父亲为人处世很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思想风格,他一生淡泊名利,鄙薄附炎趋势和追求升官发财,自奉俭朴,严于律己,办事公正清廉。他热心推动和兴办家乡的教育和各种公益事业,深得地方各界的好评。1926年,他应嘉定教育界人士的邀约,从上海回到嘉定出任县教育局长。据他后来所说,当时他在上海工作月收入约有银元150元,而县教育局长月薪只有银元50元。他不计个人得失,欣然回到嘉定,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一番贡献。1928年,因遭到国民党县党部的忌恨、打击,他不愿屈从,愤而辞职。后来他长期担任江苏省农民银行嘉定分行经理。1947年,“苏农”总行任命他为南京分行经理。南京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嘉定只是一个小小的三等县,这对我父亲当然是极大的提升和重用。但他不以为荣,不愿离开家乡去南京高就,竟然辞职以拒。当1948年底我入党回到嘉定时,国共内战双方胜负已成定局,何去何从当然也是摆在我父亲面前的大问题。我父亲没有国民党的后台背景,而且按照他平时一贯的作为,他不可能再去追随国民党寻找自己的出路。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对他晓以大义(国家民族前途利益的大义、地方社命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义,而这正是我们党的革命主张和革命政策的威力之所在),他是完全可以转变立场,